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書社

译注 周振甫

审阅 黄永年

文心雕龙选译



文心雕龍選
評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刘仁清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文心雕龙选译

周振甫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128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第二批50种)

67110/48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文心雕龙》这部书，清朝章学诚称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
“自出心裁，发挥道妙”（《校雠通义·宗刘》）。
谭献称“文苑之学，寡二少双”（《复堂日记》）。
这是说，这部书在古代的文论中是体大虑周的，既是笼罩了有关各家著作，又是有独创的。这些评价，是有道理的。

这部书，包括了文学、文章学、修辞学、语法几部分。就文学、文章学说，有文学、文章学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文章学史论、作家论、鉴赏论。就修辞学说，有风格、文采、炼意炼辞、章句对偶、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就文法说，《章句》篇里提到用字造句成章，又讲

到了各种虚词。就文学和文章学理论说，对前人的学说都加笼罩，并提出自己的创见。这一切正是“体大虑周”，“自出心裁”。

刘勰的这种“文苑之学”，在古代还没有一个作者能够像他那样体大虑周地著为一书，包括这样丰富的内容，具有这样完整的体系。就这点说，确实是“寡二少双”、独一无二的。

刘勰和他的时代

刘勰（约465——约522），字彦和，生活的时代，在南北朝的刘宋到梁代。他的祖籍在东莞莒（山东莒县）。东晋时，莒县属北魏，东晋明帝在京口（江苏镇江）侨置东莞郡。刘勰的祖和父都住京口，可知他也生在京口。史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梁书·刘勰传》）。刘勰年轻时投靠定林寺的僧佑，有十多年时间，替僧佑编定定林寺的经藏。他编经藏前，先要“博通经论”，即对定林寺内所藏的佛经和其他佛家著作都博通了，才再按照各部类加以著录，并对各部类的书分别说明，最后写出序论。刘勰编著《文心雕龙》，

利用了他编辑序录定林寺经藏的经验：先“博通”所有四部书，即当时所有的经史子集，再加上“区别部类”，对经史子集都有所论列，并选文定篇，研究各体文的著作要求，分别加以论述，这就同于编经藏的“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了。

刘勰编定定林寺经藏以后，就著作《文心雕龙》。该书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501—502）。

“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刘勰把《文心雕龙》送请沈约鉴定，当在齐末梁初，所以“天监初（502），起家奉朝请”（可以参预朝会），当是沈约推荐的结果。接着“中军临川王（萧）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都是萧宏手下的属官）。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县）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萧统手下掌呈文书的官）。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僧佑在天监十七年（518）五月卒（《高僧传》），梁武帝派刘勰去与定林寺僧慧震再整理经藏。完成后出家为僧，改名慧地，不满一年即死去。

刘勰经历了宋齐梁三个朝代，那是一个变动的

时代。这个变动是从东汉末开始的。从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大一统以后，形成了豪族地主的武装割据。东汉时州郡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遭到破坏，魏文帝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在政治上给豪族地主特权，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从两晋到宋齐时代，经历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争夺政权的长期战乱，分成南北朝。东晋、宋齐偏安江南，为取得南方豪族地主的支持，实行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再就当时人的学术思想说，东汉王朝提倡今文经学，宣扬谶纬迷信。到东汉后期的大儒马融提倡古文经学，不宣扬谶纬迷信，兼注《老子》，说明儒家学风在变。到曹操提倡刑名，儒家礼教更受冲击。“文体因之”，“渐尚通说，说则修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到王弼、何晏用老、庄思想来讲《易经》，《易经》与《老子》、《庄子》称为三玄，玄学盛极一时。加上九品中正制的“上品无寒门”，豪门地主占据了高位，与玄学结合，造成“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干宝《晋纪总论》）。在这样的风气下，晋代的文风，“缚旨星稠，繁文

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追求华藻。加上“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同上），造成玄言诗。于是，到了南齐的文风，便一种是“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一种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唯睹事例，顿失清采”（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针对当时的风气，要起来纠正。对于贵族仕宦的子弟占据高位，空谈而不务实事，他在《程器》里加以批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针对当时的文风，刘勰批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明诗》），“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指出文风有浮诡讹滥的毛病，他的《文心雕龙》就要纠正这些毛病。

刘勰既认为当时的文风有毛病，又称“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但他又赞美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无为论》、《无名论》，称它们都是“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从这里来看，他讲当时文风的流弊，是就一般的情况说

的。他并不因此抹杀当时杰出作家的成就。他的作家论也这样，对一位作家既看到他的优点，也不放过他的缺点，看得比较全面。这就证明他的评论，是有辩证观点的。

文之枢纽和文体论

刘勰在《序志》里把全书分为五部分：一、文之枢纽；二、论文叙笔；三、剖情析采；四、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五、长怀序志。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文之枢纽，是文论的总纲。《序志》里称这部分“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就创作的根本问题看，结合文学、文章学的史的演变，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依据什么思想来指导创作。魏晋玄学起来后，加上佛教的盛行，于是依据什么思想来指导创作成了问题。刘勰提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来，就是要依据“道”来创作。由于圣人是通过经书来明道的，所以要师乎圣，体乎经。换言之，要学习儒家的圣人和经书，这是总的要求。所以要提出这个总的要求，还是为了纠正当时文风的弊病。当时文风的弊病，前面指出是浮诡

讹滥。针对这样的弊病，要举出具体的正确的作品来作模范。而道家、佛教的书都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只能举出儒家的经书来。但他提出师圣、宗经时，他的看法也是辩证的。即以儒家的道和经为主，但又不排斥其他各家的道。在《原道》里就有取于道家的自然，在《诸子》里论诸子书，除了“弃孝废仁”和诡辩外，其他各家之说和文，有可取的都取，这又显出他所见的广博。但另一方面，在《论说》里又指出“本乎道”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不能只依傍一家学说来写。在《诸子》里指出汉人依傍儒家来写，就不如先秦诸子的自开户牖了。《明诗》里指出，东晋依据道家思想来创作，也失败了。说明创作还得靠创造，所谓师圣宗经只能作为效法的榜样，还要通过自己的认识来创作，而不能照抄别人的思想。这样，他也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即怎样对待不合乎儒家之道的书。结论是要采取其中可取的部分，即使如纬书那样，虽然不可取，也应酌量采用它的辞采作为创作的资料。第三个问题，怎样解决文学的依时演变问题。对此，刘勰提出“变乎骚”来，即从《离骚》里去学习文学的因时演变。

在“变乎骚”里，刘勰的看法又是辩证的，即不是专讲《离骚》的新奇。他通过分析，指出《离

骚》在哪些方面是继承经书的，哪些方面是新变的，即把继承和新变结合起来谈；又在《通变》里对继承和新变作了发挥；在《时序》里又具体指出《离骚》的新变“出乎纵横之诡俗”，以及怎样吸收了当时纵横家游说夸张之风，从而对文学的演变作了新的发挥。在学习“变乎骚”时，又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他是要求要有选择的学习的。

再看刘勰的文体论，即“论文序笔”。在这部分刘勰要回答两个问题：

一、怎样分文和笔。在刘勰之前，颜延之曾提出三分法：有韵为文，无韵而有文采的为笔，无韵而无文采的为言。这样，《诗经》是文，传记指解释经的书，如《左传》等无韵而有文采的是笔；《易经》《书经》《春秋》等经无韵而无文采的是言。这个分法，跟刘勰论文主张宗经就发生了矛盾。照颜延之的说法，除《诗经》外，别的经都不是文，那么论文怎么宗经呢？这个说法，在当时很有影响。比如，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选》便采纳了颜延之的“文笔三分法”。他在《文选序》里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表面上说，经书与日月争光，不能节取，所以不选。实际

上认为经书是言，不能入选，不过他不像颜延之敢于老实说出。他又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子书不是文，也不是笔。而《文选》里也选笔，所以子书也可以不选了。“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部书不选，在于它们与“篇翰”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就是说赞论序述有辞采文华的也在选取之列。由此看来，萧统是赞成颜延之的意见的，而且像上面关于“赞论序述”的认识，比颜延之讲的“传记则笔而非言”讲得更清楚些。

刘勰论文却与上述观点不同。因为他要纠正当时文风的弊病，所以要提倡宗经；而宗经就得承认经书是文，不是言。对此，他先举出《易》为例，说：“《易》之《文言》，岂非言文？”（《总术》）《易经》的乾卦、坤卦里有《文言》，标明这些言是文的，所以《易经》是文。但这话的理由不充分，因为对方可以说：《文言》是文，可是《文言》以外的《易经》有很多不是文。或许刘勰也看到了上面的话理由不充分，所以他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

圣》），只要理精气秀的都是文。理精是就理说，秀气与情有关，即抒情生动突出之意。经书中富有精理秀气的文辞，所以经书是文。子书史书也一样，所以子书、史书也是文。现在以有形象或抒情的为文学，所以讲先秦文学，有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把子和史中的大部分归入文学，对经书中的大部分也如此看待。刘勰不讲形象，他以“精理秀气”为文，在《物色》里以“情貌无遗”为文，而提到“情貌”，就已有情和形象在内；又讲“秀气”，跟突出情有关；他论各体文又讲风格，这又跟文学有关。由此可见，刘勰的看法，以秀气、情貌无遗和构成风格的为文学，更与现在的所谓文学接近些。而颜延之、萧统对文学的看法，则显得过于狭隘。

二、分体选文的标准和对各体文的写作要求。

在分体上不能多谈，只举一例。如刘勰称“杂文”这一体，包括宋玉《对楚王问》，枚乘《七发》，扬雄《连珠》，东方朔《答客难》。萧统《文选》把宋玉《对楚王问》归入“对问”类，东方朔《答客难》归入“设论”类，枚乘《七发》归入“七”类，陆机《演连珠》归入“连珠”类。刘勰的“杂文”一类，萧统分为四类，说明萧统的文体分得更琐碎了。其实“对问”“设论”和“七”都是主客